

Dorothy Smith：
為弱勢者發聲的女性主義社會學者

王增勇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一、對昱瑄的回應

在新批判期刊的邀約下，本人很高興由原本的匿名審查人現身，有機會藉此專欄透過昱瑄的文章談一些與建制民族制有關的人與事。在審查昱瑄的文章時，我讀到昱瑄書寫自己的恐懼，這其實不是昱瑄個人的困難，而是所有社會科學工作者在當前客觀化知識主導的學術環境下都有的恐懼。這讓我想到建制民族誌創始者 Dorothy Smith (以下簡稱 DS) 生命中也曾遇到的書寫障礙，她說，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完成任何可發表的書寫。我想我有很大的困難認我自己在男人主導的社會學論述中發言的權威。……我腦海裡有個想像，有一長排的裁判等著要打擊與批評我的作品。不過，現在我能夠把研討會當成是一種跟女人『說話』的方式，而不是將自己暴露在別人判斷之前的過程。我知道我是為女人而寫，我盡力寫好，而這些將成為許多女人可以繼續對話的一部分。¹」(作者譯)

我猜聰明的昱瑄是採取保護措施，在不知道審查委員知識立場之前，先符合主流規範，等審查委員初審意見回來後，再決定是否要讓自己更出場些。但這樣的學術規範正是導致書寫者無法從自身經驗書寫的元兇，也正是建制民族誌要批判的對象。因此，為了讓昱瑄的文章可以符合她所選擇的研究取向，我給昱瑄的建議是把自己寫進去，不是介紹建制民族誌，而是分享使用建制民族誌的解放經驗，因為我們會被建制民族誌吸引是因為它提供被壓迫者一個發聲的機會，而在昱瑄的文章中，這個被壓迫者就是學校評鑑制度下的新進學者，包括昱瑄在內。

¹ Dorothy Smith 的自我敘事，取自 http://faculty.maxwell.syr.edu/mdevault/dorothy_smith.htm。





從自身經驗切入（from within）是建制民族誌對傳統社會學的反轉，從經驗出發所以研究者可以跳脫既有理論分類概念的侷限，而貼近生活經驗。更重要的是，作者必須先自我揭露自身的社會位置，研究才会有「溫度」，故事就能「召喚」其他同樣受苦的人接續分享，進而建立婦女運動所期望的姊妹情誼。因此，我的建議就是鼓勵昱瑄把自己寫進去：「這個主題顯然與作者自身的社會位置有關，但作者並沒有揭露自身如何從日常生活中的斷裂經驗覺察，……這種由建制民族誌所提供的知識生產形式，對作者自身面對體制的影響為何。這個自我揭露的經驗應該是建制民族誌最獨特也最寶貴之處：讓知識生產成為反抗的可能。」在後來的修正文中，昱瑄很清楚地指出社會學者無法書寫自己的困窘，因此必須藉助建制民族誌的原因：「為何主流社會學的研究總是在研究『他者』、幫助『弱勢』，可是當我們自己處在各種權力關係的建制中，被捆縛得動彈不得時，卻沒有能力自我救贖、繪製出交織作用在自己身上的權力關係地圖，找出改變遊戲規則的樞紐」清楚認知到這張學術權力網絡的複雜，昱瑄將自己的研究定位為臺灣學術權力民族誌研究集體行動的開啟。我也相信在現有學術評鑑制度下喘息或窒息的新進學者會接續昱瑄的努力，把自己作為臺灣新進學者的肉身經驗轉化為反抗的動能。對於昱瑄修改後的文章，我感到很滿意，因為它讓我看到昱瑄這個人，以及她號召新進學者的熱情。

二、我與 Dorothy Smith

看到昱瑄與 DS 在相隔半世紀卻站在類似的社會位置，學術機構中的女人，卻經驗到相同的困頓，而昱瑄可以從 DS 的反抗中找到養分，成為面對自身處境的力量。我不禁由衷佩服 DS，因為我總是在她的徒子徒孫口中聽見類似「這個女人改變了我的一生」的話，我也相信這樣的影響會持續發生。

在國外念書的臺灣人，大都會有一種從尊師重道的權威關係中被解放的經驗，上課可以吃東西，可以叫老師名字，甚至可以成為老師的朋友。「尊師重道」彷彿是被留在臺灣的遠方記憶，不曾預期會在強調平等的北美學術殿堂中看到。當在多倫多大學念博士班的時候，我就耳聞 DS 的大名，但從未見過她本人，直到一天我要去上課，走出電梯時，看見我的指導教授 Sheila Neysmith 與其他兩位教授恭敬地站在電梯旁等待，不久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走出來，幾位教授隨後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對於這一幕西方人尊師重道的演出，我完全傻眼。事後才知道，那位老太太就是 DS。我後來跟指導教授談起這件事，我知道她們對 DS 的恭敬完全出於內心對她終生貢獻女性主義與批判社會學的敬重。但那時，我只敢遠觀，不敢親近 DS，因為聽學長們說，論文口試如果要好過，就不要找 DS，因為她很嚴格。那時的研究生腦袋只想著趕快畢業。

直到我通過資格考要提論文計畫書時，我提議使用口述歷史的方式進行居家服務的研究，我的指導教授告訴我，這種研究設計太安全並挑戰我思考不同的研究路徑，至少要能說出為何口述歷史會比其他種方式更好，並舉例 DS 的建制民族誌。她鼓勵我修 DS 的課，因為她是多倫多大學稱的上「大師」(the great) 的學者。硬著頭皮，我修了 DS 的課，為的是要證明口述歷史比建制民族誌更適合我的研究問題。結果，DS 的方法可以讓我深入看到臺灣居家服務體系背後的意識型態。我寫了一份有關老人服務與家庭照顧意識型態的報告，拿了 A，DS 十分稱許，基於修課的成功經驗，我也鼓起勇氣邀請他擔任我的口委。就這樣展開我與 DS 的學習之旅。

論文寫作過程中，我希望結合傳科與建制民族誌，作為理論架構。DS 的學生都警告我，DS 不喜歡這樣，這讓我格外焦慮。作為社會工作學生，我對於社會學理論雖不熟悉，但又必須論證傳科





的規訓權力與建制民族誌是互補可結合的。偏偏 DS 的著作中又鮮少提到傅科，我必須自己完成兩者的比較。我覺得我好像是夾在兩個大人之間的無助小孩，擔心自己會動輒得咎。為了鼓勵我，我的指導教授 Sheila 有一天告訴我一個故事。她說，她第一次遇見 DS 是 80 年代初期的一個研討會中，同為女性主義學者，我的指導老師利用午餐時間坐到 DS 旁邊，想認識她。結果，她們才剛開始聊天，DS 就問她說：「你有讀過傅科的著作嗎？」當時傅科還不甚有名，又與社工無直接相關，於是我的指導老師只好說：「沒有」，結果 DS 居然說：「那我想我們沒有甚麼好聊的了。」Sheila 用這個故事告訴我，顯然有一段時間，DS 很受到傅科的影響。這個故事讓我放心許多，事後，我向 DS 求證，DS 不記得這件事，也可能 Sheila 是為了鼓勵我而編造了這個故事。故事的真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老師為了幫助我完成論文而給的支持與鼓勵，成為我人生的溫暖記憶。

DS 對於我論文中有關她與傅科的比較居然都沒有提出抗議或質疑，對我的研究發現初稿給了非常詳細的評論與建議。她提了很多寶貴建議，但我印象最深的一個評論是，她對於我認為居家服務員因為她們的女性特質而勝任這份工作的詮釋，直接說「我不喜歡這個說法！」，而沒有給任何理由。現在回想起來，DS 對於任何性別歧視的觀點都很敏於覺察，對於我不自覺流露的「女人天生適合照顧」觀點，自然無法忍受。當時讓我驚訝的是 DS 的直接，以及她對感覺的信任。原來「感覺」，而不是理智，也可以成為評論的依據，這讓我日後更看重與相信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並相信這些感受是有意義的。現在想想，我的論文其實沒有充分落實建制民族誌的精神，DS 在評論中也只涵蓄地說希望我可以再多一些時間琢磨建制民族誌。

當我畢業後回到臺灣教書，越發瞭解到 DS 的重要性。2004 年底，DS 應中山大學唐文慧老師之邀到臺灣講學兩週，在她已經很滿的行程中，她仍答應我到陽明演講。當天所上學生直呼：「我從沒看見一位這麼老，而且還活的這麼好的女性主義學者！真是令人振奮又安慰！」擔任翻譯讓我又有一次向她學習的機會。

陪伴她的三天讓我又有機會認識她。她來到臺灣最不習慣的就是別人每次都要幫她拿行李，她不喜歡被當成需要協助的老太太。敬老尊賢的美德對他來說，是對她主體性的冒犯，因此她拒絕別人幫她提行李。她說，她因為常常旅行，因此她特別縫製兩個背包，可以一左一右交替斜背，形成平衡的負重狀態。她說：「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不只要在心智上強壯，也要在日常鍛鍊自己的體力。」她有健身的習慣，住在臺灣旅館時，還鬧了笑話。她向我抱怨，臺灣旅館健身房的舉重法碼雖然不重但看起來卻很大，當她練習舉重時，引起旁人注目，讓她也覺得不好意思。當時年近八旬的 DS，拒絕當別人眼中的老太太，仍企圖挑戰旁人對女性的框架。

她離開前，我答應她要在臺灣好好教授建制民族誌，讓更多人可以學習這套方法。她大為高興，我知道當時年近八十的她最大的心願就是看到自己一生心力所發展的研究路徑可以被傳播出去。因此，即使她已經退休十餘年，她仍然四處演講，辦工作坊，出版書籍，終身為她所相信的價值而活。但是今年（2012）我申請 DS 來臺灣訪問，國科會審查委員居然以 DS 「年事已高，學術生產已不活躍，對臺灣貢獻有限」的理由否決了她的來訪，這種無視於事實又極富年齡歧視的審查理由，真讓人不服。





三、Dorothy Smith 的故事

是怎樣的人生造就 DS 成為女性主義學界中不可忽視的學者？DS 於 1926 年出生於英國，她高中畢業後曾從事不同的工作，後來在出版業擔任秘書行政工作。她認為念大學有助於她找到一份更好的秘書工作，因此申請進入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就讀社會系，主修社會人類學，被社會人類學深深吸引。她入學時已經 26 歲，後來在學校認識她丈夫，William Reid Smith，結婚後，兩人於 1955 年決定一起到美國柏克萊大學社會所繼續攻讀博士。攻讀博士期間，DS 生育兩個兒子，並在生下第二胎的九個月後於 1963 年拿到博士學位。不久，她與先生離婚，據說是她先生無法接受在學校比他表現優異的 DS。同時承擔照顧與經濟重擔的單親角色，對 DS 是個重大衝擊。她在柏克萊社會系擔任講師，教授社會學。她是全系四十四個教授中唯一的女性教師。

當時，社會學家 Jessie Bernard（1964），² 出版一本有關大學女性所經驗到的不公平。當時舊金山舉辦一個有關婦女潛力的大型研討會，在這個氛圍下，DS 鼓起勇氣組織一個論壇。論壇中，DS 檢視柏克萊各系女性教師的人數與工作狀態，並邀請各系女性教師分享她們的故事。這是 DS 在學院中經驗到的性別不平等，這是她開始思考婦女經驗的重要起點。

由於隻身在外，沒有家庭支持，DS 離開柏克萊回到英國，卻發現她跟兩個兒子都不喜歡英國，但因為她們不認同美國參與越戰，所以她們不願再回到美國，於是 DS 接受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聘書，到溫哥華教書，並在那裡創立婦女行動團體，

² Bernard, J. (1964) *Academic Wome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開啟她的婦運參與。1977年她與一群學生一起到加拿大多倫多的安大略教育研究學院（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簡稱 OISE）社會系任教，直到 1999 年退休。OISE 始終保持社會運動與實踐的教學理念，是加拿大重要的激進學術工作者養成的搖籃，而 DS 無疑是其中重要的學術巨人。我到 OISE 上課，身旁的學生幾乎都是關心弱勢族群的社運工作者。學生中流傳一句話：「在 OISE，如果你是白種異性戀男人，那你就太遜了！」，可見 OISE 的激進性格。

儘管寄情於社會學，DS 卻經驗到自身生活與工作之間的分裂。她在生活中身為單親媽媽的辛苦，無法在學術上找到發聲的管道；她在生活中的體驗也無法融入她在學術上的工作。從女性經驗出發，成為她重新學習社會學的開始，更成為她日後對女性主義與社會學的貢獻。發現女人的生活無法在男人主導的學術中被看見，成為她反省社會學的起點。她從作為家庭主婦與母親的真實經驗出發，作為探索背後社會建構的起點。

但這一切都不如此理所當然，而且都在痛苦中摸索。DS 試圖要提出女人社會學（sociology for women），她提出「女人觀點作為社會學的批判」。DS 認為我們的文化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但誰是據有支配地位的建構者？我們文化中的符號字彙都反應男人的立場，而這樣的觀點連女人都深刻地內化，所以女人無法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與書寫。這是因為男人的立場以一種普世與客觀的權威觀點呈現，包括社會學在內。在 DS 的觀點，權威是指用語言讓事情完成的能力或權力。語言具有意義，作者扮演重要角色。DS 指出：男人的身體使得他的說話具有信用，而女人的身體讓她的說話失去信用。DS 指出傳統社會學試圖建構一套客觀知識體系，將社會學者自身真實存有經驗加以排除，造成社會學者無法從自身出發，分析





自身所處的社會建構世界。更甚者，這種自外於自己經驗的知識生產方式往往不自覺地在支配關係中進行，DS 稱之為「客體化知識」。

接受男人觀點成為普世立場的結果就是女人被排除並被噤聲。歷史上，女人一直被邊緣化。她認為要反抗社會學作為「男學」的困境，就是要有「為女人而存在的社會學」，這成為後來的建制民族誌。這種研究路徑的基點就是研究者要從聆聽、旁觀的外來者的位置，重新移到受訪者的位置，跟她們肩並肩站在一起，為她們勾勒一份她們所處的權力地圖（Campbell & Gregor, 2002）。³

DS 的重要貢獻在於她把語言補充進入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她擴展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把後現代觀點的語言與文本分析納入，賦予馬克思分析新的生命。DS 從少女時期就對語言極有興趣，對 DS 而言，語言是權力的載具，因此生活語言與建制語言是完全不一樣的語言，因為它們會將人編織進入不同的權力結構之中。所以，「he killed himself」（他殺了自己）與「he committed suicide」（他自殺了），雖然都是同樣的意思，但 DS 說這兩句話背後的權力機制不同，前者是生活語言，是人們在生活中溝通的語言，而後者是助人專業語言，將引發社會自殺防制機制的啟動（Smith, 1987）。⁴ 掌握語言背後的權力機制，是建制民族誌從日常生活看見權力運作的關鍵。馬克斯主義將意識形態視為統治階級的想法與想像成為文化中的支配觀點，因為少數的統治階級掌握了社會生產機制。所以你我所相信的都是被我們無法掌握的文化工具所影響。

³ Campbell, M. and F. Gregor (2002) *Mapping Social Relation: A Primer in Do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Toronto: Garamond Press.

⁴ Smith, D.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這些意識形態的想法被組織與鑲嵌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常識。這些訊息透過「文本」滲透進入生活不同層面，組織與建構我們的閱讀與理解，並產生頻繁與一致的詮釋，這些理解已經成為常識，以至於我們連獨立形成這些想法都不需要就脫口而出。這種以文本為媒介的統治關係是 DS 對當代社會運作的重要觀察，也因此解釋為何權力可以跨地運作在每個角落，而參與者卻往往不自覺。

很多建制民族誌的初學者都感到要掌握建制民族誌很難，我也深感同意，但我覺得它之所以難，並不在於它是很深奧的理論，而在於它要求我們拒絕使用既有理論與概念的慣習，因為這些都可能是既有權力結構的複製機制。這個堅決反抗使用既有理論概念的立場，對我們這些畢生學習專業科目的學者而言，是何其困難，等於是自廢武功，放棄使用學術語言，等於放棄學者的權威與權力。直至今日，我仍不時經驗到使用既有概念的習慣與方便，而不易與它們抽離並產生批判距離的困難。無怪乎，DS 在她的自我敘事說「至今我仍在 unlearn 社會學」。

